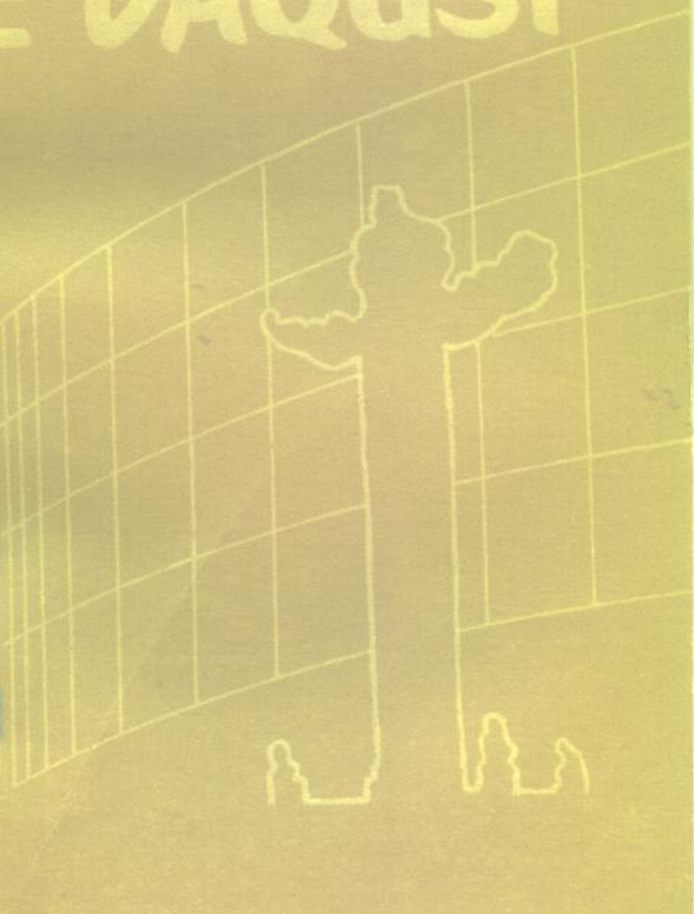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大趋势

安徽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DAQUSI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大趋势

单少杰 朱 勇 洪银兴 俞可平 会 丰

谢重光 乔晓冬 焦国成 夏伟东 姚新中

责任编辑 尹宣明

封面设计 蒋万景

中国社会科学大趋势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4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3102·627 定价：1.30元

前 言

现代化浪潮，冲击着世界每一角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急剧变化。以各种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也面临着崭新的课题，孕育着重大变革。

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研究表明：任何运动着的物体，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它都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系统——动力系统与平衡系统。前者使物体得以运动，后者则使物体在运动中保持稳定。社会也是一样。对社会内部两大系统的分别研究，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职能性分工。现代社会既需要功率超强的动力来源，更需要强化社会自身的平衡功能。否则，社会本身的“倾斜”造成各质点前进方向不一致，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运动力的互相抵消，从而影响社会的前进速度。

社会现代化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产品的丰富，隐藏在物质表层深处的，是社会关系的变革，是人自身的现代化。中东地区几个石油大国，国民的年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国家花费巨款引进一些尖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物质设备。然而，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却依然故

我，维持在十六世纪的水平；各种社会关系甚至带有浓郁的中世纪农业社会习性。丰富的物质产品与落后的社会关系，构成一幅极不和谐的社会图案。社会现代化，应该是幅射状的全方位发展，在技术、制度和思想等不同领域，共同地除旧布新，形成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新文明。

八十年代初，我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现代化运动之中。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各种社会关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经济、教育、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重新探索，这一切促使社会科学各学科冷静地思考：如何完善自身，在呼啸而来的现代文明中，忠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

我们十名博士研究生分别以各自的研究领域——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七个专业为对象，根据社会现代化变革对本学科提出的理论需求与传统理论的尖锐矛盾，有选择地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学科难题；并且作为尝试，对于各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预测性意见。

朱勇

1986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朱 勇	(1)
当代中国青年与中国社会科学未来	单少杰	(1)
现代法律与中国法学研究	朱 勇	(17)
经济模式比较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洪银兴	(45)
当代政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俞可平 陈惠丰	(79)
我国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谢重光	(119)
中国伦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焦国成 夏伟东 姚新中	(154)
科学技术革命的教育学反思	乔晓冬	(200)

· 单少杰 ·

当代中国青年 与中国社会科学未来

作者简介：单少杰，男，一九五三年出生。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一九八四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认识论。

历史是进步的，但不应把进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量的均匀增长过程。历史的进步是阶段性的，不表现为平滑上升的斜坡，而是呈现为梯级形态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变动中，不是依据年龄自然增长一岁岁一个个依次进入社会的，而是一代代地登上舞台的。每一代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和历史功过，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历史落差来。

同样道理，观念的变革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也不是匀速递进的，其间会有一些较大的起伏。这不是一条均匀的抛物线，而是间隔有较大突峰的曲线。这些大幅度起伏的突峰便以强烈的社会思潮形式表现出来。

并且，社会思潮本身也不是在社会各层次人中均匀泛

化的，它在青年中表现得格外激烈，甚至有时以极端形式出现。一般说来，年纪大了，阅历增多，人就越发重实起来，或因吸取诸多经验教训而稳健持重，或因长期浸泡在历史浊流中而粘附上厚厚的淤垢，……（当然也有些人至老童心不已，但这不是多数）。他们中许多人也会随着历史潮流前进，但往往易于沉入潮流的低层。与此不同，青年人几乎一无所有地进入社会，身上没有沉负，因而在动荡之中，被抛向潮流的上层。他们欢快激越、无所畏惧，弄得水花四溅。他们可能相互碰撞，互相抵消，但总会有一部分立于浪峰之巅，可能看到在潮流低层所有看不到的景象；他们最终也会沉入低层，但毕竟领略了潮头的欢快、而不后悔。青年是社会思潮的弄潮儿，在跌宕起伏中获得了新的见识和敢于竞争的生存勇气，从而有力地冲击和改善既有的社会心理结构。

每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都对民族心理发生影响，但这些影响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来。有些短暂些，有些则久远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进步青年的历史作用，可能要比前后几代人突出些。他们掀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不断发展演变，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格局；在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精神风貌中，无论是优点还是局限性，都在民族心理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当代青年在对前人的评说时，自然会反身问己，提出“我们能否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些”这一富有责任感和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有人会投来怀疑的眼光：年轻人，要

知道你们是被颠簸得最厉害的一代啊！对此，青年人也许眨眨眼；我们大家都曾经坐在同一辆车上，但同样的颠簸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应，它既会抖散一些人的骨架，也会使另一些人很快掌握抗颠簸的技能。在这里，青年人也许要占些便宜，因为他们本来就具有较好的适应机能和恢复机能。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反应，这或许是历史丰富性的一种表现吧。无可否认，这代青年有短处，但也有独到的长处。别的姑且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发展机制问题上，他们有可能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们有自己的潜在优势。

当代青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潜在优势既有其内部根据，亦有其外部条件。

就内在方面来说，当代青年有着独特的经历，既是“文化大革命”的虔诚的参加者，又是它的无情的批判者。对这场“革命”的悲剧性经历及其反思，使他们有可能较为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能以那样的速度、那样的广度和深度展开，决非一两个偶然因素或某些领导人的偶然失误能够说明，而有着广阔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由多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引起的。其中封建主义因素起着相当的作用。我们民族曾经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封建主义的一些胜利，1911年赶走了皇帝，1949年推翻了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但在思想文化上没有能对封建主义传统作出彻底的清算，封建主义仍以各种形式保存在一般社会心理中，甚至影响

着一些领导者的思想方式。在这场“革命”中，我们不难看到许多带有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东西，同时也不难重新发现阿Q、赵四爷和吴妈。当然，封建文化传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同中国革命实践的某些具体特点，党内政治力量对比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等许多因素交互影响，合力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物。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危机，促使我们民族内在的东西作剧烈的外化或对象化——因为人一旦处于危急点或临界点就会释放出自身最大能量——有善的，也有恶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机会——认识民族的现状，认识民族的历史（现代人的素质中包含了前人的沉积物）。当代青年生逢其时，身临其境，“有幸”看到了这出闹剧。

当代青年在认识我们民族的同时，也对自身做了深刻的反省。既然作为这场浩劫的参加者，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不可与那些身居高位者同日而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代青年暴露了许多弱点，或者说许多不成熟之处。例如，缺乏独立的个性精神和民主意识，不是真正以主人翁身份进入社会，常常沦为单纯的政治工具；缺乏对世界先进文化和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了解，盲目地排外，盲目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无知；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往往把革命过程中一些畸形变态物当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东西；……当代青年通过其悲剧性经历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并且做出积极补救的努力。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对国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经济改革抱

着积极参与的态度，对科学文化知识有着热切的渴望，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特别是人道主义的研究，则表示了他们要求从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当代青年在对民族历史进行认识的同时反观自身，把自己与社会互为参照地思考，既有冷然的客观性，也有炽热的主体性，从而达到作为历史主体者所应有的自我意识：较为客观的自我评价（我是什么）；较为实际的奋斗目标（我应怎样）。

总之，灾难多变的民族历史和悲剧性的个人经历赋予这代人（特别是其中的理论工作者）一种深切的历史哲学意识。他们沉入社会表象的底层，从自我意识的深处去思考历史，爱寻根究底，不满足现成给定的结论，总是处在思虑的不安之中，总是企图透过社会现象去寻找历史运动的复杂机制。纵然不能说他们的历史观如何正确，但毋庸置疑，这里滚动着他们真诚的心声。

当代青年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潜在优势，除其亲身体验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外部条件。首要的一条是国家处于大乱后的相对稳定时期。

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蒙受浩劫后的稳定时期往往是理论成果卓著的时代。苦难的遭遇使人们迫切地了解，灾难的原因究竟何在；并且渴望知道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对于能动的历史主体特别是对那些历史意识较强的民族来说，历史灾难并不能使理性泯灭，相反却刺激和促发出强烈的探索欲望。而大劫后稳定的社会条件保证了一部分人能够坐下来，潜心地回顾和思索。他们将用观念再一次复

现历史悲剧的过程，并提出它的动因和后果。希腊城邦战争之乱，促发了柏拉图对“理想国”的玄思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创立。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及其后一段政治经济都“可耻”的历史后，有一个理论思维昌盛的时代，演奏了哲学上的“第一小提琴”。中国秦末大乱后的汉初和隋末大乱后的唐初，都有一个热烈讨论以史为镜的阶段，表现出我们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我们民族又进入了一个历史反思的阶段，当代青年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渴望充分利用当前稳定而良好的社会环境作出积极的理论创造。由于人类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因此一个民族不经过一个充分的理论准备时期，要想在经济、政治以及整个文化领域作出巨大的卓有成效的跨越是不可能的。

社会稳定时期经济生产的上升也给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七五计划国家决定拿出两千亿投入到科学教育事业中，这对民族文化的腾飞，无疑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并且，在社会生产稳定发展时期，也容易造成一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社会风尚。当一个民族从劫难中苏醒过来时，首先感到的是极度的贫困，因此，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刻不容缓。经济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它所要求的效益和价值的观念也波及社会各层次。注重现实利益的社会风气，虽然有轻视理论的负作用，但却有利于淘汰那些无用的陈词滥调。现在，对于那些振振有词的空谈者，

老百姓的脸上常常呈现出睁一眼，闭一眼，咬着嘴唇东张西望的喜剧性表情；对于那些打棍子、扣帽子、玩弄刀笔者，群众则报以冷嘲热讽。真理标准理论的补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新学习，是我们民族求实精神觉醒的理论表现。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双百方针的坚持，将保证理论界的正常竞争和新陈代谢。

当代青年的理论探索还有较好的国际背景，他们生逢全球性对话的时代。从积极方面说，喷气机和通讯卫星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间的距离，多元文化实体的并存展示了科学文化的丰富性，使人们感到有可能、也有必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消极方面看，工业正大规模地吞食着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同时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地球的生态平衡，大量核弹的存在，犹如把人们置于随时可爆发的火山口上。这些问题可能引起的灾难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人们普遍感到地球生存空间非常之狭小，大家同乘一叶扁舟，为了避免一起翻船，不同背景的人都觉得有必要坐下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尽管各自的诚意有别。总之，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对话，不同文化体系在进行相互渗透。

全球性对话为当代青年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有利于破除闭关自守的狭隘观念。我们老大帝国自诩天下第一的遗风在理论领域也颇有显露。孤陋寡闻，却自以为是；不了解新观念，却要求对它有终审权。似乎有一种庄重感，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反差现象，深深的自卑感逆转成肤浅的自尊心；害怕与他人竞争，却硬

说他人不愿为对手。广泛的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思想冲突，将打破这种理论上的虚荣心，要求当代青年具备坦荡的胸怀，敢于迎接理论的挑战。

其次，有利于吸取人类的全部优秀成果(列宁语)。信息时代使人们面对着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复杂图景，从而激发出要求驾驭各种观念的综合性意识。因此，生逢此时的当代青年有要求有可能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思考问题，在丰富多采的文化成果中进行选择，努力使自己的精神产品不带有或少带有“小生产”的色彩，而具有“世界文化”的性质。

总之，当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性经历，激发了他们要求探索历史运动机制的强烈意向。国家的相对安定和全球性对话的国际环境则为他们的历史探索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当代青年的理论探索将是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大致要经过怀疑、迷惘、选择和建树等一系列阶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侧重分析其中的选择的问题。

在当代青年的理论探索中，对各种观念的汲取和选择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四人帮”长期奉行思想专制主义和文化壁垒主义，既压抑了中华民族理论创造的积极性(这也与我们祖先只述不作的经学传统有关)，又割断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从而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泛、抽象、冷清和僵化的状况。因此，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和唤起中华民族理论创造欲望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然而，在民族文化振兴的最初阶段，汲取与创造相比要显得相对迫切些。因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创造必须建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安格尔曾说：从虚无中是创造不出新东西来的，只有构思中渗透着别人的东西，才能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荷马的子孙（《安格尔论艺术》）。理论的创新也是如此，必须了解和熟悉现有的水平层次，才能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首先要触及前人的肩膀，而后才能立于其上。

在实际过程中，理论的汲取主要表现为理论的选择。从客观上说，现有思想资料是丰富驳杂的。各种理论形态背景迥异，风格不一。尤其现时信息爆炸，各种思想材料铺天盖地而来，从主观上说，具体理论工作者接受思想材料的方式是有限度的。他们的理论目的所指是特定的，他们立意要解决的是特定的问题，而不是一切问题。并且他们对材料的消化能力受到自身既有心理结构的限制，他们总是捕捉自己可能会理解的东西，他们手中拿着的不是大口袋而是筛子，尽管开始时网眼很大。总之，有着特定理论背景的人对于纷繁复杂的思想材料的汲取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有必要指出，理论的汲取和选择必须以世界文化为广阔背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仅其所要阐明的事物的真理性不会因人种、地域和国别而转移，而且其所属和使用也应该是世界性的。理论的选择应该是面向世界的。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民族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

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经历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精力忙于战争，建国后又受左倾思潮干扰，思想文化建设不够充分，有许多薄弱环节。因此非常有必要汲取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这样可以较快地缩短差距，加速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如果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是不够的，还必须推及到与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文化领域。因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有着相应广阔的文化背景，它的支撑点散立于社会各领域中。中华民族应该较为系统地、全面地学习他民族的长处，应该具有能够容纳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胸怀。那种盲目地拒绝外来先进文化成果的民族自大狂是愚不可及的。这对我们民族来说尤应警惕。在我们民族传统中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它在现代的一种表现就是面对世界先进文化常常弹出“古已有之”的调子，盲目地尊古，盲目地排外。更有甚者把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也移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用昔日尊奉孔子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其偶像化，进而凝固化。这不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于推进民族现代化。

当代青年在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汲取与选择的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首先，他们对于新观念、新思想有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甚至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饥饿感。这有两方面原因：从社会背景来看，“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中国理论界的长期饥馑的状况，从个人思想发展来看，青年在经过

激烈的怀疑之后陷入个人迷惘之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空虚感。因此可以说，当代青年对新的文化知识有着双倍的饥饿。

其次，他们在选择新观念时没有多少先在的，僵硬的思想框子。因为他们在激烈的怀疑和否定的阶段，曾经对他们能遇到的一切既有观念都作过批判性的思考，使一切未经充分证实的原则都失去了它的确定性和至尊性。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多少难以改变的成见。

再者，他们对于选择过程中的理论舍弃也没有多少难以分别的眷念。选择与舍弃是同步的，肯定即否定。对于既有观念，青年本来就涉足不深，因而旧情不厚；并且在材料的掌握和观点的复述上也无多优势，因而也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既得利益。不仅对旧有理论，而且对新选择的理论也有一个舍弃的问题。青年在理论选择中不可能每一次都是正确的。他们对不正确的选择，有些还没来得及意识到，有些意识到了。而一旦意识到错误，他们会同样坦然地抛弃它们。因为，不仅涉足旧观念不深，而且与这些新理论相处也不久，不致难舍难分。

实际上，每代青年世界观的形成，都应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他们把前人思想资料同亲身实践的感受加以对照比较，作出综合性思考，有所接受，有所剔除，有所创新。这里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与前人的区别。这种区别从积极意义上说，正是历史台阶式发展中的级差，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如果青年不加思索地全盘接受前人思想资料而无创见，那么这只能是毫无出息的一代。即便是前人的